



↑ 马哲民



→ 许涤新

## 已有经济学说在范式上存在不足,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探索空间

对于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与科学性,民国时期部分学者认为,不仅体现在与中国特殊经济背景与现象的对接上,更体现在已有经济学说在有关人性假设、方法论以及研究目标上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上,而中国经济学正是要在此方面做出探索。民生经济学相关研究在此领域阐述颇多,不过其中不免有对已有经济学说的较为片面的解读,以及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偏理想化的看法。

人性假设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同的假设会导向不同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运用,这成为部分学者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立论点。1944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学说》一书将已有经济学说和所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进行了比较,特别在人性假设方面进行了分析。书中认为,“西洋的经济学说虽派别纷歧,但考其本源,仍有相同之处。他们无论那一学派,总以人类欲望为出发点,以推论经济现象而构成其学说的系统”,而中国古来的经济学说,“各有不同之处,但论其本源与目的,莫不脉络贯通。他们都不以人类的欲望为出发点,尤其不以个人一己的私欲为出发点。他们的学说都本于人性”。而在这里,人性似乎可大致解释为符合“仁义”的伦理道德,因为书中有论述,“顺乎人性的富强之术就是王道,反乎人性的富强之术就是霸术,以义为本就是王道,以利为本就是霸术”。

与人性假设的差异相关,方法论上也就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分。很多近代学者认为,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更具有优越性,是中国经济学应采取的。1943年,徐天一在《经济论衡》第1卷第2、3期连续撰文《民生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和《民生主义经济学的体系》,指出当前流行的经济学说,“基础是在个人的私利的追求”,其方法论就表现为“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进而“由于这些个人的求利活动的相遇,乃形成一种自然的机械的经济生活”。在徐天一看来,正是这种机械方法论,将经济学的研究引入到对交换环节以及价格体系的关注上,使得经济学“沦为一种与数学或物理学一样的自然科学,把存在与当为完全分开而完全以存在为研究对象的科

学”,所以不能成立。相反,民生主义经济学则是一种“全体主义经济学”,特征之一便是“要求人人为主体的福利而活动”,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民族生产力和民族福利的提升;而且研究的对象,也成为了“现实的巨体的经济体”,这样一来,民生主义经济学便把经济学提高为“生活的科学精神的科学之经济学”。

正因人性假设和方法论存在不同,自然而然地,很多学者表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在于“养民”和国家社会的发展,而非已有经济学说的谋利。例如,前文提到的《中国经济学说》正是认为中国经济学是“以民生为目的”,从而使得“经济学的目的,也超越利润追求之上”。符逸冰在《精忠导报》1943年第8卷第2期的文章《现代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中也指出,“应该研究的经济学必须选定是一种配合中国民生需要,合乎中国现状,用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而应用以促进社会国家进步为‘目的’的经济学”。类似的,祝世康在《经济论衡》1944年第2卷第3期的《民生主义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中提出,“一部民生主义经济学,就应该是养民之学。这种养民的经济学既成为一种规范的以及目的论的科学,自然与已往经济学不同而自成一个体系”。

\* \* \*

近代以来,我国学界出现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诉求与论证,这是与时代发展相呼应的。中国自19世纪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国家被卷入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全球化浪潮,无论在科学、技术还是经济上均受到剧烈冲击,随即,外国的经济学说便被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看作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经济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向西方学习”由此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学术发展的一条主线。但该过程中,部分中国学者并非仅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在主动学习的同时,更积极主张实现舶来经济理论与中国本土的相互融合,从而开展了一系列的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探索尝试。在此基础上,更有一些学者并非停留在如何“用得对”和“用得好”的层面。出于对已有经济学说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困惑,出于对已有经济学说范式可能存在不足的察知,甚至是出于提升中国本位文化、树立民族信心的情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诉求就此产生。以上因素也是构建中国经

济学的探索和实践在近代以来的百年间长期出现的部分原因所在。

近代有关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讨,揭示出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项本质问题:如何处理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王亚南在提出中国经济学时对该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论述,但仍有学者表示了不认同。如许涤新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中指出,“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有它的特点。……但是这种特点并不是‘遗世独立’,并不是与世界其他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真理绝缘的”,“既然不能与一般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则脱离,为什么又要标出‘中国经济学’来表示这一门‘科学’的‘独特性’呢?”(《工作通讯》1950年第43期)有关提法的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也曾于我国学界广泛出现,所显示的正是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不同理解。对于特殊性的强调,也非中国学者所独有。例如,英国制度经济学家霍奇逊曾主张把历史特性问题重新提上经济学的研究日程,并为此专著了《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

然而,中国经济学在近代未能建立。主要原因总结起来,一是近代局势的动荡和经济发展的落后,二是经济学术的落后。近代学者对以上两点也有一定的认知。如王亚南在阐述政治经济学是作为舶来品输入时,曾指出“中国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环境”,由此,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建立中国经济学也必然面临巨大的困难。另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是中国近年最盛行的一种科学”,但“反照我国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在‘述而不能作’的时期”,甚至在“述”的过程中,“对于基本经济理论未懂清楚和未能融会贯通的,实居大多数”(张素民《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界》,《自修》1939年第56期)。不过也须指出,此表现符合我国经济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接触舶来经济学说后,必然需要较长一段的学习、认识和理解过程,能较好掌握甚至与已有经济学术对话已是极为难得,而在此背景下,近代学者能够提出并论证中国经济学构建这一时代命题,其开创意义不容小觑。

[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本文得到“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17ZDA034)和“近代学术中国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学构建研究”(2017110720)项目资助]

◀ (上接14版)

王亚南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在《新建设》1941年第2卷第10期发表,该文主要从两个层面论述了中国学术界现行经济理论的问题所在:

第一,不同于前文学者多以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与中国现实对接、因而不能直接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观点,王亚南虽然也陈述了中国现状的特殊性,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资本主义对世界行使的统治,已日复一日地暴露了破绽,苏联经济形态的飞跃发展,更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黯淡的前途”,所以“我们对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但必须采取加以批判的态度,并也可能采取批判的态度了”。

第二,现行的、也是对我国经济学术影响颇深的政治经济学体例,存在逻辑上的问题。“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四分法”,不仅没有突出生产的“中枢地位”,还造成了对现实中的经济运行的“强行割裂”;而“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说”,“都是消除了任何例外,除了历史限制的一般的表现方式”,是经济学者设计出的公式。据此,王亚南提出,“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主张一方面要明确认知现行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性质和局限,另一方面也要“逐渐努力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

1944年11月14、15、18日,王亚南在《东南日报》发表《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连载,文中他对此前自己提出的“中国经济学”能否成立进行了具有学理性的

论证。他指出,从19世纪末起,经济学研究已从“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狭义经济学,发展到“以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的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经济学。这便要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包含所有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同一历史时期下的不同情况。特别是对于中国,“中国的封建经济型,在世界一般的封建制中,显示了极大的特点”,所以,“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较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不在狭义经济学的含义上,而在广义经济学的含义上,在广义经济学完成的过程中,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词来,是有其必要的”。

在此基础上,王亚南进一步分析了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可能,他指出,“中国经济学”的提出,就是为了强调对于中国经济这一特殊对象的研究,而这种用意和限定,也恰恰提供了中国经济学的可能性,“它不是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内,自划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研究藩篱,反之,它正好是依据或应用现代经济学及现代经济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来发现中国经济的特质,及作用于中国经济中的基本运动法则和其必然的演变趋势。……那不但是一般经济学的世界性,毫无所损,且可说是对于一般经济学的原理的发挥,对于正在形成或完成过程中的广义经济学内容之直接的正面的充实”。以上论述,便在“经济学应存在一般性”的框架下,找到了中国经济学得以成立的科学立足点。